

晚清财政理论的西学东渐

——基于文献综述的分析

毕学进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中外相关经典文献,研究了近代财政理论西学东渐的基本驱动、镜像和嫁接过程,并探究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近代财政理论引介,是在财政新困境下旧制度无能为力之时的历史选择。西方财税理论主要是通过日本引介到中土,具体内容包括西式预算理论与财政分权理论。在晚清江河日下的财政危机下,经过广大知识分子的呼吁,清廷尝试了西式预算试办和国地两税划分转型。虽然学界对西式财税理论引介过程持有一致结论,但一方面,经济学家往往认为西式财税的中土转型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财政面相,带有“现代化”色彩,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则认为晚清皇帝依然对财政有最后的决策权力,因此对其价值不应当被高估。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可能是学科研究差异所致。因此,未来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加强跨学科合作,进一步挖掘历史细节,利用财政学理,深入剖析近代中国财税制度转型的理论渊源与改革程式,客观评判晚清西式财税转型的“现代化”问题。

关键词:财政理论 西学东渐 预算 财政改革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4-0101-12

晚清西式财政理论的西学东渐,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财政转型路向,虽学界对此问题关注颇多,新论迭出,然略显遗憾的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人关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与嫁接过程,往往呈现出因循性、重复性探究,难以找寻新的研究进路。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外相关经典文献,给出西式财政理论西学东渐的基本研究图谱,分析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分歧,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路向,以期明晰新的研究进路。

一、何故引介:近代财政理论接引中土的驱因

引介西式财税理论,一方面,是本土传统的理财模式已不能应对新的财政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西方财税理论驱动了西方国家走向富强,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

中土的财政困境自然引发知识分子的焦虑。何烈(1981)在《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一书中,对咸丰同

[收稿日期]2021-01-27

[作者简介]毕学进,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史。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研究”(批准号:20AJY018);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15ZDB037)。

治年间的财政基本面相进行了深入剖析。他的研究认为在咸同时期,清廷面临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梁义群(1992)的研究认为,辛丑条约签订,导致中国对外赔款加累计摊还本息高达近十亿两,财政走向崩溃。陈秀尾(1994)的研究认为,晚清政府虽然通过洋务运动有自强之心,但是受限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导致洋务运动等多项革新措施无果而终。王燕(2018)的研究认为,晚清的财政问题,严重引发了财政危机,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广征苛捐杂税来解决财政困境,本已处于沟壑之缘的人民面临巨大的苛税压力,以致民生凋敝。洪均(2017)的研究则认为,从咸同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即面临巨大的变局。一方面财权的不断下移,导致地方督抚拥有实际财权,中央已缺乏全局性财政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财政资源的全局性调配能力失去之后,严重影响了中央整体宏观性职能发挥,导致国家宏观治理能力下降,这在盐政中的表现尤其凸显。蔡国斌(2009)考察了晚清的财政搜刮问题。他指出,晚清时期中国的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清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搜刮的方式以应困局。各地区捐税层出不穷,旧税加征,新税开办已成常态。然而各类捐税的加征开办导致地方实质性的财政独立,这也是出现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分庭抗礼的重要诱因。马金华(2011)的研究认为,晚清财政逐步走向困境,不得不通过举借债务来应对财政困难。庞大债务使清政府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导致利权旁落。

财政上的困难,自然要考虑到旧制度是否能解决新困境。Davis C B(1984)探讨了晚清时期英美银行在中国本土扩张带来的新问题,认为英美等国的财经制度明显要优越于中土的旧制度。Yeung K T(2007)、杨国强(2014)通过研究发现,自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运动波及中国半壁江山,导致税源锐减。同时巨大的军费开支又加剧了中央的财政困难。为此,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虽缓解了财政困境,但旧制度应对新问题已显得苍白无力。马金华(2007)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地方督抚自行举债,影响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导致财政管

理日趋混乱,财政日益困难,原先的奏销走向崩溃,无法应对新的财政危机。陈锋,蔡国斌(2015)的研究指出,清初的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晚清已被打破,尤其是解款制度的日趋废弛,导致中央的财政日益困难。Frank, F(1973)以清代中国公共财政调查的多卷财报和众多地方志为基础,详细揭示了定额征收附加费的复杂性,为各省区实际征收的地税提供了第一个现实的估算,也揭示了土地税新旧之间的复杂性。

Liu, Qionglin(2020)的研究认为,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广东地区拥有多个海关区域。他分析了位于中国陆海资源交界处的外国海关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核密度估计,如此巨大的海关规模,用中国传统的闭关锁国思想应对新的对外贸易自然是处处不适。Cheng L(2017)的研究认为,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事件,它是由外国传教士缓慢引进的,这意味着西方经济学的传播是被动开始的。而与之对应的,Tuan-Hwee(2014)认为清政府在1750年后经历了财政紧缩,这对清政府应对新问题产生了不好的影响。Sng T H(2014)认为,在旧的委托代理制度模式下,鉴于监控困难,王朝代理人有强烈的动机勒索纳税人。这迫使清政府保持低税收以防止叛乱。经济扩张可能加剧腐败,导致财政进一步疲软。O'Brien(2020)探讨了明清帝国农业经济问题。从17世纪明朝灭亡开始,中国有哪些现实可行的选择来缓解日益严重的问题?这些选择包括沿着西方路线的工业化和结构性变革吗?清政府用以抵御西方侵略、维持内部秩序和积极干预的战略范围仍然受到严重限制,这些战略旨在增加对帝国不断贬值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是在大范围还是在密集的耕作范围内。Shiue C H(2004)通过研究晚清时期的粮储问题发现,救灾改变了地方政府自我保险的激励机制,由于政府间的财权已经改变,这导致了新的道德风险问题。

很明显,以上的新问题是旧制度难以解决的。正如任金帅(2012)研究所指出的,当中国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而传统的理财方策根本无能为力之

时,学习国外的富强之道,引入西方的财政管理,这成为民族救亡图存的必然之义。

早在 1865 年,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就以《THE INDIAN BUDGET》报道了印度预算的基本情况^①,这是目前能找到的较早在中国境内传播预算的文献,比以往学者认为国内预算传播来自于黄遵宪 1887 年成书的《日本国志》早 22 年。在这份文献中,报道了印度预算产生过程中的争论,虽其内容并无多大价值,但就其本身的争论而言,表明印度的财政预算至少已经不再是君主独断。显然,这份报道并没有引起国内的足够关注,因为直到 22 年后,驻日参赞黄遵宪才第一次将“BUDGET”翻译成“豫算”,直到近 30 年后的甲午战争前后,因慑于日本的快速崛起,《日本国志》内的“豫算”二词才引起国内的广泛关注。郑海麟(1988)对《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析,认为其书内的施行预算决算保证年度收支平衡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随后,不少学者对西方国家的财政内在理路进行了探讨。顾奎斋(2003)分析了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路径。他的研究指出,西方国家在近代以工商税作为财政基础,这远远比农业税具有更大的税源力量。工商开源是西式财税理论的经济基础。顾奎斋(2004)又从私有制形态分析了英国等国家的税赋形成路径,提出英国“低度私有”下,税赋可以依据社会条件的变化与经济动态演化设立不同的税赋目种。当然,西式财税最本质的特质还在于公共性和共同需要性。顾奎斋(2016)又指出,西方财税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和共同同意,而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为上,为君主式财政。

究竟西方的财税理论管理优越在于何处?其一,在于财政分权理论合理配置了资源,降低了信息成本。Colm 和 Musgrave(1960)提出,在财政分权视角下,央地二级政府拥有较好的财权事权划分体系,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B.R.Weingast(1995)指出,近代西方之所以会迅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分权下的市场激励行为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

发展,使要素可以在市场上自由配置,并且有第三方力量监管政府。其二,在于财政的预算约束。Einzig P.(1959)的研究指出,议会控制下的财政避免了君主个人意志的财政行为,从而预算有了一定程度约束,财政收支绩效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其社会公用。North D.C(1989)指出,英国财政的预算约束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公共选择权力。Elman(1991)探讨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阻碍了财政革新。明清时期的考试是对当时社会制度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复制的一种手段。他采取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来抨击旧的考试制度并不适用于新的财政人才选拔,考试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Kiser(1992)利用统治者与国家官员关系的委托代理模型,导出了关于国家官僚机构腐败的数量和类型的若干命题。该模型被应用于明清中国的财政官僚机构,侧重于统治者在衡量应税资产、监督和制裁国家税务官僚权力寻租方面面临的问题,分析了明清两代统治者改革财政体制的尝试,探讨了改革总体失败的原因和改革成功的地区差异。这似乎表明官员的腐败问题,很明显制约了政府的财政改革尝试,引进新的制度规制成为政府的重要考虑话题。Axelrod(1988)指出,预算对于近现代化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公共权力和民主权力的必由路向。章伟(2005)分析了美国“民主预算理论”,对美国财政的政治逻辑进行了详尽分析,势均力敌与民主多元的预算模式是美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往往擅长从理论视角探寻事实,历史学家则更擅长从史实角度辨析问题。刘增合(2014)的研究认为,西方财税的预算以及财政分权使泰西诸国税制有章,财制有程,故引起晚清知识分子的注意。陈锋(2018)分析了晚清财政预算的引入问题,提出晚清财政愈趋混乱,而西式财政管理简明有序,故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Ramon H. Myers(2008)的研究也认为,外国经济学引入中国,其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精英认识到中国应该从西方接受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武器,还有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史学家基于对相关史实的分析,就晚清财政改革进行了研究,因

^①THE INDIAN BUDGET[N].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1865-5-20-002.

其仍然在于晚清财政困难与西式财政丰盈对比的史实分析,故在此不再赘述。

因此,从学理角度而言,晚清时期泰西诸国已经通过财政改革方式规范了财政管理。其财政改革的驱动因素一方面有其共同需要、共同利益下的公共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则是工业革命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因应变革。其财政改革的关键维度有二,分别是财政分权下的资源最大化配置与预算的议会约束,最终实现了国家富强。而对比江河日下的晚清财政,知识精英尤感焦虑,他们在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之时,亦将西式财政理论同器物制度一同引入中土,并欲酝酿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二、何径引介:近代财政理论接引中土的门径与内容

西方财政理论的引介是从何路径而来?虽然西式财税理论发源于英法等西欧国家,但是奇怪之处在于,对西方的财政学说不是直接取径于英法,而是“日译西学”。焦润明(1998)探讨了著名维新派改革人士梁启超的日本观念,认为梁启超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即对日本社会制度产生了较大兴趣,引发了向日学习的热潮。Hao Chang(1976)的研究也指出,在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头几年里,他融合了西方的流行文化和政治参与观念,生成他“新公民”理想。Ting Xu(2010)的研究指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深受日本影响。孙中山认为日本是中国效仿的榜样,在日本的强烈影响下,他赞成采用集体主义的方法来实施经济政策,并强调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历史上确实有诸多留学生、驻外大臣翻译了日本的著作并传播。1898年,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的钱恂,十分关注西方财政理论,在日期间,着重考

察与学习了西方财政理论。1901年,钱恂出版《财政四纲》一书,按租税、货币、银行、国债四个方面对西方,尤其是对日本的财税制度进行详细考证^①。《时报》还开辟专栏“本馆论说”发表留日学生《论统合预算财政法》一文,推介了日本学者浅井虎夫所著《支那法制史》^②,该文又被《东方杂志》以及《广益丛报》转载。《民报》在1906-1907年,通过连载方式,刊登了留日学生朱执信执笔介绍德国学者华格纳《财政学》的文章,后又刊登了宋教仁介绍日本小林丑三郎《比较财政学》的文章。民国初年,《比较财政学》一书还由中国图书公司公开出版发行,颇受推崇^③。故马金华(2018)说,清朝末年西方财税理论的传播实际上是“导源西籍,取径东瀛”。

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地译著日本西式财税理论,具体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政府预算理论与财政分权理论。最系统最全面引进这些理论的,是一些外文报刊。如《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在1903年以《Budget Concessions》为题,报道了印度预算的贫富差距调剂功用。在该文中,印度当局拟通过盐税优惠措施,改善贫困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一个将受到那些由于高盐价而不得不大幅减少消费的贫困阶层的欢迎”^④。《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在1906年10月又报道日本的财预算赤字情况,提前的预算使政府对次年的财政盈余情况了如指掌,进而可以提前通过干预措施防范财政风险^⑤。《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在1907年发表《BUDGET ECONOMIE》一文,提出日本预算重视公共设施的建设,体现出预算的经济效用^⑥。《The Municipal Gazette》在1909年又报道了英国预算的形成过程,指出1905年以来英国十分重视警察预算的支出,同时“群众反映的普通支出和额外支出的项目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误导的,议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应在明年之前通过和公布关于这一点的一些明确裁决。”^⑦通过对这些外文报刊的梳理,大体可以了解到,西式预算的显著特质在于:(1)限制王权,议会拥有对预算的绝对决议力;(2)预算拥有调节社会公平的功用,体现出财政的公共属性;(3)预算能

① 介绍新著:财政四纲[J].新民丛报,1902(6):95-96.

② 论统合预算财政法[N].时报,1905-1-16.

③ 比较财政学:日本小林丑三郎之伟着中华民国宋教仁之雄译[N].申报,1912-12-15.

④ Budget Concessions[N].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03-5-5-002.

⑤ JAPANESE ESTIMATES[J].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06-10-16-007.

⑥ BUDGET ECONOMIES [N].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1909-10-23-008.

⑦ Budget for 1909 [N].The Municipal Gazette (1908-1921),1909-3-13-002.

提前预知下年财政收支,进而予以提前干预防范财政风险。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些外文期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西式预算的引介上,邹进文(2002)对清朝预算理论引进的背景和内容进行了分析,对西式预算制度的具体程式也进行了探究,认为在国势颓废情况下国人引进新制度,以求救亡图存。董霏(2016)考察了在宪政视野下清政府引介预算制度的背景与内容,提出预算制度的引介与中国预备立宪的整体政治形势有一定关联。刘增合(2009)对清朝时期预算制度的本土引介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他指出,知识分子牵强附会地将西方的预算思想跟中土传统理财思想进行融合,导致西式制度在中土的传播或多或少偏离了原先的本意。梁发芾(2010)亦探讨了西方财政预算理论在中土的传播过程。他认为中国本土在历史上并无预算制度,西式预算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引进与磨合,最终促进了清末预算的推进。当然,财政的分权思想自然也是引进的主要内容之一。邹进文(2011)对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进行了考辩,提出财政分权内容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权,还包括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夏国祥(2011)研究认为,西式财税分权理论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仅局限于财政分权的常识性传播。马金华(2018)的研究也指出,财政分权经过多渠道引介到中国,催生了清政府央地两税分税改革的尝试。

西式财税理论的引介群体,既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还包括西方教会等群体,是一个外出被动取经与西学主动叩门的双向传播过程。马金华(2018)研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漂洋过海,到日本等诸多国家主动学习西方的财政理论以求国家富强。张锐智(2007)则考证了驻日大臣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内的宪政思想及近代经济与财政思想,推动了晚清政府的宪政改革。郑双阳(2012)则考察了严复的经济思想,认为其经济价值思想是主动接触西学下产生的科学方法论。除此之外,还有对郭嵩焘、郑观应等一系列主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考究西学的论述,因多数是对西方经济发展与内在制

度的因循考究,故不再赘述。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外,外国的传教士对西方的财政理论也有引入。如,范文田(2008)对传教士在晚清时期传播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了分析。邹进文(2013)研究认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携带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促进了晚清经济学财政学的西学东渐。李丹(2016)认为对外国来华传教士带来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王冰青(2018)分析了教会书院在中土的设立过程,提出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开设书院,传播西学,在中西经济思想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Tsien(1954)的研究认为,西人通过翻译渠道,对中土输入西方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等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改变国人的知识结构。Trescott(1989)认为,英国人约翰·弗莱尔在中国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受雇于上海的中国政府翻译局,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手册》和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对中土士人的财政知识结构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Trescott(1989)的研究甚至指出,弗莱尔的翻译对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1885年傅兰雅的翻译出现时立即发表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他敦促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以改善人民的经济福祉。Cochran(2000)研究了西方和日本等国外公司涌入中国投资传播经济思想,改变了中土经济模式。Trescott(2010)分析了西方经济顾问在中土经济学的传播,“尽管经济发展尚未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学术领域,但西方顾问在许多与发展相关的话题上提供了非常明智的建议”,这推动了中国的改革。

在关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介中,学者侧重考查西方财政理论的传播途径与影响,虽然目前对西方财税理论的引介途径与内容已有学者涉及,但不同群体对于西方财税理论究竟是如何认知的,有何差异,目前鲜有前贤涉足,西方财税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国人对其认知的基础上而引介,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不同的引介论向,对这一问题应引起关注。

三、如何嫁接:近代财政理论的中土移植

从既有文献而看,虽然知识引介分为分权理论

与预算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二者却又是交叉进行的。换言之,晚清的财政西式转型中,是分权与预算齐头并行的。

最先拉开序幕的是地方财政的清理。刘增合(2011)详尽探讨了这一问题。在光宣之交,度支部择选财政监理官赴各地展开财政清查。外省督抚对此大为恐慌,在敷衍与抵触下,财政监理官依然核查出各省隐匿财政规模十分巨大。陈典、陈锋(2015)的研究指出,晚清时期财政清理活动之时,各省编撰《晚清财政说明书》核报了各地基本的财政数据,这为下一步预算开展奠定了基础。张佩佩(2011)还专门探讨了地方的财权清理活动,她的博士论文专门针对东北三省的财政清查活动,分析了财政监理官清查财政的基本程式以及督抚的因应方略。无论从何种角度判断,地方财政清理很明显遭遇较大的阻力,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地方隐匿的开销各款,具有一定的意义,为后期的央地两税划分与预算试办奠定了数据基础。

在地方财政清理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清政府随即酝酿试办预算。陈锋(2009)考察了晚清试办预算的酝酿和实施过程。他认为在黄遵宪引入西方预算知识后,自甲午战争失败,引发时人对日本改革的向往,已然形成预算改革的政治氛围。1906年御史赵秉麟上奏试办预算,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随后度支部酝酿了预算实施方案,在各省设立财政调查局以掌握地方收支各款。蔡毅(2020)集中考证了晚清时期财政预算从编制到实施的过程。他认为在各省财政清查基础上,中央政府旋即开始了预算的筹办工作,预算编制完成以后,交由资政院集议,通过后向皇帝(摄政王)请旨批准。这就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份预算案,史称“宣统三年预算案”。随后清政府又拟于次年续办1912年预算,在试办程序以及预算各款方面较1911年预算颇有改进,但因武昌起义随即爆发,并未付诸实施。刘增合(2009)研究了西方预算理论引进后的财政改制问题。他的研究认为,在光宣之交酝酿的试办预算设想,成为开明派人士寄望于解决财政困境的唯一可行路径。但是这一制度在移植过程中可能并不顺利,诸如收

支的改良、例案的删减均遇到较大阻力。而旧式的财政管理方略,诸如奏销制度与协饷制度成为新式预算试办中的阻碍性因素。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学者对西式预算的引进过程进行了考证,但大多数没有脱离财政清查、收支核定、预算程序等视野,故不再赘述。

预算酝酿之际,财政分权亦随之展开。Hon-wei(1985)对晚清财政集中化的最后尝试进行了分析,他回顾了晚清财税分权的基本过程和程式,认为晚清希望通过财政改革,提高财政资源的调配能力。刘增合(2008)探讨了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问题。清末省级财政机构通过精简部门、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无序到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在重组初期,把重点放在减少开支上,后期则重视制度建设改革。光绪年间,财政制度的调整首先是由地方长官自发性推动。宣统年间,外省财政机构受到了中央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尽管各省督抚按照法令进行了改革,但他们试图保住真正的财政收入权力。刘增合(2008)随即又探讨了清末西式税制的引入与央地两税划分的问题。他指出,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境,清政府朝野上下积极引入西方财税思想,并将西方的财税分权制度划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两种,试图嫁接中土以期推行。但是,这种分权思想大多来自于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种全新的税制,新思想与旧制度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矛盾,由于学说认知互歧,各方对如何界定央地收支标准各执一词,两税划分难以推进。孙翊刚(2002)对中国地方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研究认为,地方税在中国古代并不成立,因为地方无权自行设立税种并自由征收。在清末,西方两税思想引入中土,在筹备宪政中,有在宣统五年订颁国家税地方税章程的表述。这种制度上的设计推进了两税的划分,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辛亥以后随即终止。

四、如何评价:近代财政理论的中土移植的价值审视

老树接新枝,是否改变老树的衰暮之态?对于晚清西式财税改革的近代化转型,有学者认为,旧

制度下嫁接新制度,重塑了财政管理,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意义重大。如,LAI(1991)认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取径西方,对中国近代制度重塑具有十分重要现实价值。邹进文(2002)认为,西式财税在中土广泛传播,引发了清政府财政的“现代化”改革。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接评述改革的价值,但他用“现代化”评价改革的性质,亦可见作者对改革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持有肯定态度。Li M Y(2003)的研究则指出,晚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外部政治危机、前所未有的内部叛乱和经济停滞。他采用博弈论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对立的政治和经济结果作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平衡的表现。Krug(2008)认为,1911年的中国财政改革有一定作用。他研究指出,公共财政是指超过年度的国家预算和宪法程序,包括外债、国家垄断或货币政策,所有这些在过去一百年中对中国的公共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研究表明,晚清时期中国即已确立公共财政运行规则。朱鸿翔(2013)认为,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个别到总体、由零星到系统、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这个传播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西方财政思想的传播对于近代中国财政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赵云旗(2016)的研究认为,清政府的财政改革标志着中国财政向现代化迈进。其依据在于财政预算体例、预算科目、财政分配关系的整体演变下,出现了传统王朝时期所并不具备的铁路等公共财政支出,因此,他将清末时期定位为中国的财政现代化转型过渡期。马金华(2018)认为,晚清实施的新式预算,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颇具公共财政面相,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王文素等(2018)研究同样认为,清朝末年的财政改革,是引进西方限制君权下的制度移植,这表明传统时期依附于君权的财政开始转向颇具民意基础的资政院以及各省咨议局。因此,他们的研究认为,晚清时期的财政改革,迈开了财政近代化改革的关键一步。

然而又有另一派学者认为,在旧制度与新知识之间,时人对于如何在帝制土壤下移植西式宪政制度依然一知半解,因此晚清的西式财税理论引介与

嫁接并没有完成近代化转型,对于其价值并不能高估。如,Hickey(1991)的研究认为,晚清时期施行的国家预算改革,是财政集中能力的尝试,但是其改革失败是由“官僚文化”问题造成的,即官僚程序、习惯和思维方式使未改革的制度分散化。苏全有(2010)认为,尽管现代学者认为晚清时期的财政迈向了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不能取代时效性。从教育经费的投入等问题分析,新政的现代性与时效性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民众可能并不认同晚清的财政改革。杨猛(2015)研究认为,晚清时期展开的财政清理活动,虽名义上是求新,但也是度支部尚书载泽与总理大臣及其他部门财权的一次争夺。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晚清时期的财政改革可以认定为是一种财权转移的博弈,并不具备完全近代意义上的财政转型。刘增合(2008)的研究则认为,西式税制虽然引入中土,但是财政分权等新知识完全超出了时人的认知,因为古代社会并无地方税制传统,朝廷要员对于如何划分两税体系大多一知半解,但是又想紧抓财权,因此各方对两税的划分争论不休。刘增合(2008)的研究同时又认为,清末时期的预算知识引介虽然改变了时人对财政管理的认知,但是对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新知识,知识分子隔义附会,认为西式财税理论实际上是起源于成周时期的理财模式,表明经过知识分子的过滤,传导到中央层面的财政改革,已经偏离了西式预算本来的知识与制度边界。以上论点表明,一部分学者并不认同晚清财政改革的近现代化转型。

结合史实与学理,对晚清财政改革的意义,或不应冠以“现代化”而高估。如,王文素(2018)认为,晚清财政的运行已经脱离了君主财政,其根据是预算已由资政院决议。这种有“敢动皇帝钱袋子”之名的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尚有待进一步商榷。从历史细节中可以看出,虽资政院有议定国家出入预算并有监督职能,然而在实际上,资政院议决事项是否可行,尚需请旨可否。1911年资政院核议试办预算案决议核减预算,即请旨裁决,“议决试办宣统三年岁入岁出总预算案,遵章会奏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

皇上圣鉴。”^①从亲历过晚清预算的人士著作中也可窥见,其预算试办远远未达到所谓的“现代化”。如梁启超即发表感言说,所谓的预算完全没有财政监督,只能称之为概算书,而并非预算^②。

因此,我们从现代经济与财政学理进行判断,或许可深入认识晚清财政转型的价值。

第一,从财政归属的控制权角度判断。晚清财政转型是国家权力集中的一次尝试。透过欧美其他国家转型的历史可窥见其内在理路。Hintze(1975)指出,现代化国家治理分为“政府组织”与“权力政治”两种类型,欧洲多数国家近代在“权力政治”上虽然是军事主义,但是政府组织则倾向于“议会政治”,英国即是典型的代表国家。由此可以窥见,一个国家的“组织”与“权力”归属,直接决定了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晚清的财政转型明显不具备这种“政府组织”与“权力政治”归属结构,因为资政院本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自由政治”程式,议定事项最终需要请皇帝裁决。而反观国外,《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在1904年即报道,在某国预算决议中,政府某项累进所得税的修正案,对富人的影响较大,征税遭到拒绝。国外的财税权力很明显不在行政中枢。中国的资政院或许难以看住“皇帝的钱袋子”,相反,皇帝能“限制最主要的钱袋子”。

第二,从财政支出的方向而言。持现代化转型的学者们认为,晚清预算表中有铁路、教育、实业等新型支出。Buchanan(1968)认为任何组织通过集体提供的服务或者物品,都是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供给。公共物品的提供最终判断关键在于物品实际被供给的方式。财政支出的公共性直接决定国家的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程度。经济学家从晚清预算支出结构表中看到铁路、教育、实业等支出确实有公共性的影子,但是如果深入挖掘史实,便可发现这种公共性支出微乎其微。宣统三年预算案中,行政费与军政费二者占比就高达42%,有将近一半的财政支出都耗费在了军政支出上,还有各省应解赔偿洋

款总额占比为15%,实际上的公共性支出非常少。See R(1968)指出,现代化国家财政支出的三项基本职能分别是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清廷公共性支出聊胜于无,这就直接导致政府的公共产品投入明显不足,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国家运行的三项基本职能,制约了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因此晚清的财政转型并不具备“现代化”样态。

第三,从财政的社会主导性而言。Schumpeter(1991)认为,“一旦政府进行征税,它就像一柄把手。如果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社会的结构将会随之改变”。实际上,这种论断解释了税收的“把手”在谁手上,财政就会为谁更多地服务。就财政的归属而言,归属于公共性的财政自然是在社会主导性下运行的,而归属于君主的财政,自然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行政中枢决议的。因此从财政归属似乎已经可以判断晚清财政的社会主导性。当然,更多的历史证据显示,不仅在财政决议之前人民基本无法参与决策,甚至是预算编制完成后,更缺乏监督政府财政行为的权力。因此,其社会主导性的论断也难以成立。

第四,从委托—代理视角而言。作为受托人,政府财政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保证委托人对财产所应享有的权益。从现代治理角度而言,纳税人明显是委托人,而收税者自然是受托人,二者之间受托与委托关系直接决定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但是在晚清时期的政治土壤下,皇帝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天下之主,所有的官员都必须对皇帝负责。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皇帝成为了委托人,而治税机关则成为受托人。这种“委托人异位”的异像,表明官员只有可能对皇帝负责,而不会对人民负责。这也表明,Auerbach(2010)提出的公共财政下“共同信念”与“共同利益”较难实现。因此,这种委托代理的角色不能进行完全转换,财政转型的现代化功效难以达到。

第五,从财政法学的视角而言。Mazmanian D A(2000)深刻描述了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法律参与问题。Yang(2004)认为,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在法律治理框架下,这体现了受托责任与公众参与的基

^①呈修正试办宣统三年岁入岁出总预算案说明书清单[Z].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3-7515-098.

^②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95.

本要求。Besley 和 Persson(2011)则将国家的法律能力提供视为国家能力的典型样态。由此可以发现,法律的规制作用对于限制皇帝对财政的干涉意义重大。晚清时期并不具备国家意义上的《宪法》,就连《会计法》都并未制定,对于限制君权的财政法等更是窒碍难行。当然,正式法律文本尚未出台, Schick A(2003)认为财政规则也能起到一定作用。然实际情况在于,财政程式依然服从于行政规则,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文本或者财政规则,能限制晚清时期的君主财政决策。这也表明其财政转型实践,或并不具备“现代化”特征。

五、研究展望

晚清时期西式财税理论的西学东渐,是在旧制度不能处理新问题下的现实选择。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次财政转型,正是在西式财税理论的中土引介基础之上施行的。学者们对晚清西式财税引介的路径以及嫁接过程进行了大量考证,虽对其转型价值有着不同的认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第一次转型尝试并未达到其理想效果,没有挽救江河日下的晚清财政,但是却对民国时期的财政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回到学术研究本身,虽然目前对这一问题研究已经结实累累,但是综合历史的具体真相与现代财政学理论,对这一问题还有一定的跨学科深入空间。

西方财税理论的西学东渐,既牵涉到财政学基础理论问题,又涉及到历史的嫁接过程。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方面要求学人能考证财政理论的中土引介历史背景与实施过程,尤其要具备历史蛛丝马迹的考证能力,从而以点及面,还原整个历史全相。另一方面,则又要求学人具备一定的财政理论。因为该问题始终围绕“财政理论”而展开,如果对财政理论不了解,那么研究或会有失偏颇。故跨学科研究尚有较大深入空间。

当然,除了跨学科外,就西式财税理论西学东渐的过程而言,亦有一定的深入空间,具体表现在:

第一,关于西方财政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引

介,当前学者注重“播”之分析,忽略了“引”之探讨。“引”为“播”之前提,“引”不仅代表了引进,更体现出了知识分子对西方财政理论的认识。在晚晴财政江河日下、西方财政井然有序的情况下,国人是如何认识西方财政理论的?知识分子与保守派就这一问题有何分歧和争论,最后又是如何引介的?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能够直观展现近代西方财政传入中国的具体路向,甚至左右了近代中国财税转型的政策制定。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具体研究进路包括知识精英对西方财税理论的异质化认知、开放知识分子与保守知识精英对西式财税的理论论争的“理”与“路”逻辑探究等。

第二,关于近代中国财税制度的转型真正的理论渊源,很少有学者给出直接回答。多数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是西方理论的直接嫁接,虽有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引介的财税理论经过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但是具体是如何改造的,很少有学者进行深入探究。实际上一个在“共同需要”环境下产生的新式财税理论,要与传统封建体制下产生的财税思想进行调适并非易事,还原其调适的过程,可更好认识中国近代财政制度转型起步的真正理论渊源。具体而言,知识分子提出西式财税理论是起源于中国的“成周旧式”,其学理逻辑何在?知识分子是如何将西方共同需要的预算理论进行过滤,嫁调适到帝制土壤下的中土?这都尚有待进一步探究。

第三,西方财税理论经调适引入中土后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最终左右近代中国财税转型的路向?这一研究前贤关注不多。因在调适过程中,知识分子可能并未关注中国政财权争之传统,财政理论“西学东源”式的中国化改造,虽得到各个阶层认可,但是出于不同的利益权争,不同群体就国地两税应当如何划分、皇帝对于财政的权限界定、具体预算的实施等展开了激烈的纷争博弈。那么,知识分子本土化调适的“理”“路”何在?触及了哪些矛盾?最后到底达到了何种功效?除了本土化档案、报刊、日记等史料的梳理考察外,一些国外报刊都此事件亦多有评述,需扩大史料范围,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从研究回到现实,晚清时期西方财税理论的引进与嫁接,其实质性问题还在于财权的如何分配。中央欲借预算与国地两税划分统一财权,以提升资源的统一调度能力。而地方督抚则希冀通过两税划分让地方税制得到法律承认。然而,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方督抚实质性掌握地方财权已成既定路径依赖,中央政府在分权状态下实现集权,很明显遭受地方阻滞,改革难以推进。吸取历史上“分权下集权”的失败经验,就我国当前的财税改革而言,应在“集权”的基础上实现“分权”,即在强中央政府的框架下推进财税改革,在保障中央调控大局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央地税种,规范地方举债,完善转移支付,推进“两个积极性”目标实现。

参考文献:

- [1] Axelrod, D. Budgeting for modern government[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 [2] Auerbach, A. J. Public Finance in Practice and Theory [J].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10, 56(1): 1-20.
- [3] B. R Weingas. Positive Theories of Congressional Institutions[J]. Michig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 [4] Besley, T. & Persson, T. Pillars of Prosperity: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5] Komisar J B, Buchanan J M.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J]. *Econometrica*, 1969, 51(1): 844-846.
- [6] Cheng L, Zhang S. The Spread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Features and Influence (1840-1949) [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17, 12 (2): 193-227.
- [7] Cochran, Sherm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8] 蔡国斌. 论晚清的财政搜刮[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62(1): 87-92.
- [9] 蔡毅.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试办国家预算研究[J]. *江汉论坛*, 2020(6): 111-122.
- [10] 陈典, 陈锋. 晚清财政说明书的编纂与价值[J].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2015(00): 163-200.
- [11] 陈锋, 蔡国斌. 中国财政通史 第7卷 清代财政史下[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
- [12] 陈锋. 晚清财政预算的酝酿与实施[J]. *江汉论坛*, 2009(1): 78-90.
- [13] 陈秀尾. 论晚清财政对洋务运动的影响[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1): 67-78.
- [14] Das, D. K.,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and policy concepts in the dynamic Asian economies: an overview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 East Asia*[J]. Routledge, 2016, 12(5): 49-84.
- [15] Davis C B. Financing Imperi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Bankers as Vectors of Imperial Expansion in China, 1908-1920[J].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56): 236-264.
- [16] 董霏. 宪政视野下清末预算制度的引进及探析[D]. 苏州大学, 2016.
- [17] Einzig P. The Control of the Purse: Progress and Decline of Parliament's Financial Control[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9.
- [18] Elman, Benjamin, A.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1, 50(1): 7-28.
- [19] Frank, F, Wong Y C, et al.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An Estimate of the Land-Tax Collection in China, 1753 and 1908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3, 80.
- [20] 范文田. 浅论西方经济学在晚清时期的传播途径与影响[D]. 河北师范大学, 2008.
- [21] 龚汝富. 清末清理财政与财政研究[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9(2): 25-29.
- [22] 顾銮斋. 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J]. *世界历史*, 2003(4): 2-13+126.
- [23] 顾銮斋. 由私有制形态看英国中古赋税基本理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63-68+123-124.
- [24] 顾銮斋. 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管窥 [N]. *光明日报*, 2016-10-13(16).
- [25] Hao Chang. Liang Ch' i - ch' 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6(3): 484-487.
- [26] Hickey P C. Bureaucratic 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in late Qing, China, 1900-1911 [D].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 [27] HINTZE O.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8] Hon - wei Ho . A Final Attempt at Financial Centralis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1909-11 [J]. *Far Eastern History*, 1985(32): 9-36.
- [29] 何烈. 清咸同时期的财政[M]. 台北: “国立”编译馆中华丛

- 书编审委员会.1981.
- [30] 洪均.财政变局、省区博弈与晚清国家治理能力——以咸同年间湖南盐政为中心[J].江汉论坛,2017(11):105-111.
- [31] 焦润明.梁启超的日本观[J].近代史研究,1996(1):202-213+24+215.
- [32] Kiser E, Tong X. 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and Type of Corruption in State Fiscal Bureaucracies: An Analysis of Late Imperial China[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92, 25(3): 300-331.
- [33] Krug B.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J]. ERIM Report Series Research in Management, 2008(1): 1-22.
- [34] Lai C C, et al. Types of Economic Idea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the Role of Western Thought [J].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91(20): 365-378.
- [35] Li M Y. Essays on public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hina, 1840-1911[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3.
- [36] Liu, Qiongli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Customs Districts in Kwangtung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1842-1949)[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0(11): 1-9.
- [37] 李丹, 刘明玉. 晚清西方经济学说在华的早期传播——以外国来华传教士著述活动为中心[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69-75.
- [38] 梁发带. 清末西方预算制度在我国的传播与建立[J]. 中国财政, 2010(9): 74-75.
- [39] 梁义群. 庚子赔款与晚清财政的崩溃[J]. 社会科学辑刊, 1992(3): 106-110.
- [40] 刘增合.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J]. 近代史研究, 2011(6): 102-123.
- [41] 刘增合. 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J]. 历史研究, 2009(2): 82-105+191.
- [42] 刘增合. 由脱序到整合: 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J]. 近代史研究, 2008(5): 56-72+3.
- [43] 刘增合. 知识移植: 清季预算知识体系的接引[J]. 社会科学, 2009(1): 138-146.
- [44] 刘增合. 制度嫁接: 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97-109+207.
- [45] 刘增合. “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46] Mazmanian D A, Sabatier P A.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analysis[J]. The Science of Public Policy: Policy process, 2000(6).
- [47] Benson L, Millward J A.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98, 104(5): 1647-1648.
- [48] Colm G, Musgrave R 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60, 15(1): 118.
- [49] 马金华, 刘锐. 西方财政理论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及影响[J]. 人文论丛, 2018, 29(1): 248-259.
- [50] 马金华. 外债对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影响[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07(5): 76-81.
- [51] 马金华. 外债与晚清政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52] North, D.C., and B.R. Weingas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17th Century England[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9(49): 829.
- [53] O'Brien P K. The Ming and Qing Imperial States and Their Agrarian Economies [J]. Palgrav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2020(10): 47-67.
- [54] Myers R H,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J]. The China Journal, 2008(7): 176.
- [55] 任金帅, 王先明. 从“生计”到“经济”——西方经济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演进 [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2(3): 10-19.
- [56] Schick A.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J]. Holocene, 2003, 3(3): 14-14.
- [57] Schumpeter, J.A.,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Reproduced in: Swedberg R, 1991.
- [58] Shiue C H. Local granari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moral hazard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4: 100-124.
- [59] Tuan-Hwee, Sng, Chiaki, et al. Asia's little divergence: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and Japan before 1850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4, 19(4): 439-470.
- [60] 苏全有. 有关清末财政问题的两点思考[J]. 安徽史学, 2010(4): 11-18.
- [61] 孙翊刚. 中国地方税的发展和变革[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2(2): 32-34+57.
- [62] Ting, Xu,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 -1950 (review) [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0, 17(4): 494-497.
- [63] Trescott P B. Scottish Political Economy Comes to the Far East: The Burton-Chamber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Japan and China [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21

- (3):481-502.
- [64] Trescott P B. Western economic advisers in China, 1900-1949 [J].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Methodology, 2010, 28 Part 1: 1-37.
- [65] Tsien, Tsuen-hsuei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4, 13(3): 305-327.
- [66] 王冰青. 教会书院与西学传播[D]. 天津师范大学, 2018.
- [67] 王文素, 龚浩. 论清末我国财政现代化转型的标志[J]. 财政研究, 2018(1): 124-129.
- [68] 王燕. 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J]. 江汉论坛, 2018(2): 108-113.
- [69] 夏国祥. 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J]. 财经研究, 2011, 37(3): 50-59.
- [70] Yang D. Remar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71] Yeung K T. Suppressing rebels, managing bureaucrats: state-building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0-1864 [D]. Rutgers University - Graduate School - New Brunswick, 2007.
- [72] 杨国强著. 衰世与西法 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73] 杨猛. “求新”与“谋权”: 试论载泽与清末财政改革[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12): 55-63.
- [74] 张佩佩. 清末东三省清理财政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 [75] 张锐智. 试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中国清末宪政改革的影响[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7(2): 140-147.
- [76] 章伟. 预算、权力与民主: 美国预算史中的权力结构变迁 [D]. 复旦大学, 2005.
- [77] 赵云旗. 论中国近代财政预算制度现代化[J]. 财政监督, 2016(22): 5-16.
- [78] 朱鸿翔. 西方财政思想在近代中国的理论影响和传播规律[J].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2013, 15(4): 7-9.
- [79] 郑双阳. 严复经济思想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 [80] 邹进文, 李彩云. 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1(2): 6-12.
- [81] 邹进文. 中国预算理论和预算制度的早期现代化研究——清朝末年西方预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C].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2002: 59-65.
- [82] 郑海麟. 论《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88(3): 66-77.

【责任编辑 寇明风】

(上接第 65 页)

研机构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建立工业设计、标准制定、检验检测、信息服务、融资担保等创新服务平台,引导创新资源向特色产业聚集。四是壮大产业集群。在有特色、有园区、有平台的基础上,鼓励重点企业通过投资入股、技术支持等方式,与配套企业结成产业联盟和战略伙伴,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形成一批“整机+配套+服务”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 [1] 刘丹. 劳动要素密集度增加是否促进了我国工业品的出口? ——基于 H-O 理论的实证分析[J]. 区域治理, 2019(30): 13-16.
- [2] 胡再勇. 要素密集度异质、巴萨效应和出口贸易结构——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经验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5): 145-157.
- [3] 胡晨光, 厉英珍, 吕亚倩. 研发强度、出口调节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企业要素密集度差异的视角[J]. 财经科学, 2020(4): 95-106.
- [4] 幸炜, 李长英. 基于要素密集度异质性的全行业出口增加值拉动效应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9): 92-100.
- [5] 刘文秀, 范英杰. 股权融资与研发投入——基于要素密集度与企业性质差异的实证研究[J]. 财会通讯, 2018(6): 87-90.
- [6] 霍晓萍, 任艺. 基于要素密集度视角的研发投入资本成本效应研究[J]. 财会通讯, 2020(6): 72-76.
- [7] 张伯超, 靳来群, 秘燕霞. 我国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产业间资源错配与产业结构升级[J]. 当代经济管理, 2019, 41(2): 60-67.
- [8] 何斌锋, 方晟, 冯劲. 基于工业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节能减排与稳增长的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7, 36(1): 10-14.
- [9] 张万里, 魏玮. 制造业集聚对效率的影响研究: 抑制还是促进——基于地区和要素密集度分类的 PSTR 分析[J]. 南方经济, 2018(4): 95-113.
- [10] 朱云飞, 高桂玲. 我国税收收入要素密集度研究——税收收入现代化分析的另一种视角[J]. 公共财政研究, 2017(6): 25-34.

【责任编辑 寇明风】